

陈云的核心意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李正华

[摘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陈云坚定维护邓小平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陈云的言行模范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核心意识,为邓小平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为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陈云;邓小平理论;核心意识;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9)05-0012-05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1](p.222)]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在近14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如果不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要治理好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是无法想象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要坚持“四个意识”,即坚持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最终都要落脚到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陈云的言行模范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核心意识,为邓小平在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和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认真梳理陈云的核心意识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关系,对于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深入总结改革开放40周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实践、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创立的。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是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陈云在三件大事上,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促成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二是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推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三是支持邓小平关于科学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完成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陈云和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分别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因“一贯右倾”而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则被当成仅次于刘少奇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解除一切职务,受到公开批判。邓小平1972年虽被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刮右倾翻案风”而被再次撤销一切职务。1977年3月,只有中央委员职务的陈云顶着巨大政治压力,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当时邓小平只保留着中共党员身份),促使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正式表态,同意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因此,邓小平于1977年7月恢复了党政军主要职务。邓小平的这次复出,为1978

作者:李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奠定了重要基础,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基本前提。力主邓小平复出,是陈云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重要体现。

1978年底,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率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解决好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主张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这一重要提议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和拥护,带动与会人员在“两个凡是”发起清算,为开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重要条件。2015年,习近平高度评价了陈云的这次发言,他指出:陈云的这次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积极响应,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2]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极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支持改革开放的力量。1989年11月,邓小平谈到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即叶剑英——笔者注)。”^[3](p.1295)]由于在党内的资历、能力与威望,邓小平和陈云自然成为决策层中发挥作用最大的两个核心人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内和社会上曾出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潮。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成为统一全党思想、开辟新的历史时期最为紧迫的任务。1979年,党中央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系统总结,做出决议,并专门成立了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明确要求这个决议,一方面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另一方面要把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宜粗不宜细,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①陈云赞成邓小平的主张,他对决议起草小组的同志说:“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4](pp.283-284)]他还提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

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3页。

28年历史的段落。他指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4](p.284)]这就更加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的意图。邓小平十分赞赏陈云的这个建议,他说:“这个意见很好”,^[5](p.303)]“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5](p.30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经过一年多起草和4000多人讨论,终于在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此外,《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基本内容所作的10个方面的概括,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拨乱反正中开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

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形成时期,这一时期,陈云的核心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许多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2年,邓小平为党的十二大作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p.29)]随着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三大

还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12个方面的初步概括,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

在这一时期,陈云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这些思想体现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此外,陈云在改革开放方法论、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比如:他提出改革要不断总结经验,脚踏实地向前推进;他亲自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他倡导干部队伍要新老合作和交替,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队伍;他特别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等等。陈云的这些重要思想都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三

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理论体系形成并正式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时期。这一时期,陈云的核心意识主要体现在他坚定地维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明确提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明确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对稳定政治、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

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

党的十三大以来,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①的发展战略不动摇。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在经受严峻考验中继续发展。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主要围绕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和加快发展、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要问题深入思考后的新概括,实现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基本指导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使邓小平理论进一步走向成熟。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首次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概念,并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依据,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大从9个方面系统概括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指导作用,标志着邓小平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1987年,陈云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14](p.360)}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正在外地休养的陈云提前回到北京,坚决支持邓小平。1989年5月26日,陈云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身份召集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这也是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后主持的唯一一次中顾委常委会——笔者注),坚定地维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他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17](p.481)}他要求新

^①1987年8月29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党的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1980年工农业的年总产值为7100亿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参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7年11月4日。

闻单位公开对外发布消息。陈云还曾批示：“倡导改革开放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8](pp.1800-1803)}陈云明确提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①这些都对当时稳定政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不仅正式提出中共党史上“三代领导核心”的重要论断，而且提出了稳定、成熟、有能力的判断标准。稳定不仅指中央领导的团结稳定，而且指全党的团结统一。成熟是指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成熟。有能力则是指政党的组织领导能力，包括政党的建设能力、管理能力和领导水平。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6](p.309)}他还强调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6](p.310)}“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6](p.310)}“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6](p.310)}“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深刻科学的总结。

1994年，陈云发表谈话，明确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他指出：“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7](p.510)}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党的十五大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决策，明确提出和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更加简洁鲜明的科学概念，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强调“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9](p.10)}

四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中创立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陈云求真唯实的哲学思想、稳健务实的经济思想等，丰富了邓小平理论中的相关内容，他关于社会风气的思考、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主张，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于实事求是，陈云践行了一生。陈云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思想路线问题。”^{[10](p.441)}陈云不仅在我们党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的思想方法和严谨认真的领导风格，具有求真唯实的重要特征，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和要求。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就是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高度关注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长期主持财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陈云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

^①据时任陈云秘书朱佳木2005年6月16日接受白岩松采访时回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由陈云首先提出的。

生产力;经济发展要稳中求进、活而不乱;经济发展要有利于人民;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等,这些重要思想从根本上符合人民的愿望,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为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邓小平理论确立的基础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它立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在锲而不舍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三大提出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强调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都是建立在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对国情科学判断基础上的。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陈云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准确的把握和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四个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4](p.250)}在这种对国情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陈云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比如:他主张大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但坚决反对照抄照搬,搞全盘“西化”。他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4](p.338)}他多次强调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试验要大胆,推广要谨慎,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4](p.235)}

陈云致力于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和党内团结统一。他认为: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4](p.243)}这样的党必须要有中央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7](p.510)}中央有权威,党的领导才能

坚强有力,党内团结统一才有保障。中央的权威又表现在党的领袖的权威,因此,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十分重要。陈云特别注意维护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他总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在大风大浪面前立场坚定、态度明朗,善于从政治上划清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在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同形形色色违背党的原则、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同诋毁和损害党的形象、歪曲历史、否定领袖的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陈云坚定维护邓小平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为的是党能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陈云的核心意识是他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的重要体现,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赤胆忠心重要体现,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及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2015年6月12日,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陈云同志坚定维护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同党和人民同心同德。”^[2]这是对陈云的核心意识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2]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6-12.
- [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4]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8]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0]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景怡

On the Frontier Issues of the Continuation of Rural Land Contracting Righ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n rural China is the issue of farm, and the core of the farm issue is that of land. At this stage, the key to the farm issue is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perty right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s and land. We should seriously study the following ten issues: first,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land policy and current law; second, we must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third, we must adhere to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system; fourth, we must observe the basic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of village land collectively owned and contracted by farmers; fifth, the motivation of adjusting the contracted land in rural areas is subject to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farms in reality; sixth, women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enjoy the same rights to the contracted land; seventh,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 right of land is the usufructuary right granted by law to farms; eighth, we should update the studies of the name of the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the ninth issue is to explore the paid transfer of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agricultural use; tenth, we should effectively promote farmers'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and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the criteria for choosing the system of land property right. (Huang Yan-xin)

Chen Yun's Core Consciousn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Chen Yun firmly upheld Deng Xiao-ping's core position in the central leadership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both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 Chen Yun's words and deeds exemplify the cor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sts and play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ng Xiao-ping's core posi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 Zheng-hua)

On the "Cadre-Cadr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PC for a Great Project in the New Era: Establishing a healthy and refreshing "cadre-cadre relationship"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party construction. It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need to strengthen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cadres, but also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and that between cadres and the masses. In reality, the alienation of "cadre-cadre relationship" such as commercialization, profit seeking, nepotism and vulgarization have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corruption problems, destroyed the atmosphere and overall image of cadres, and polluted the political ecology within the Par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o build a "cadre-cadre relationship" which stresses politics, comradeship, true equality and cooperation, we must conscientiously strengthe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nd politic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vide a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ith a refreshing "cadre-cadre relationship". (Zhang Zai-bin and Qi Wei-ping)

The Mission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 Analysi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Education: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education points out the mission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mission of Marxist education, and offers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The mission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mainly includes "ser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rengthening the Marxist belief of educatees", "making educatees firmly suppor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strengthening the confidence of educatees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iting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nd running education with their satisfaction", "individual-oriented personality perfection, promoting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peopl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etc. Under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CPC, educational entities at all levels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take on the new mission of education,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orientation of running schools, and firmly establish the people-centered concept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ey should also take root in China and integrate foreign-run education, build a high-level talent education system,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eaching subjects, concentrate on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collaborate to promo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 L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of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A Holistic Framework: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of ideological work has its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basis, and it is also the practical need to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ideology work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ideology work in the new era, it is theoretically necessary to stipulate the implementation subject, target, normative situation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f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ideology work, and clarify a series of related propositions such as who, whom, what, and how in the field of accountability for ideology work.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although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of ideological work in China has achieved certain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shortcomings in specific operation that call for urgent solution. At present, we must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participation, embedding, operation, information, and evaluation in the accountability process, further promote the scientiza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model of ideological work, and provide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China's competence of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Hu Hong-bin)

On the Economic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the Past 70 Years of New China: Its System and Development: The Party's economic leadership is maturing through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leadership of the CPC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we should analyze its historical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velopment motivation, movement track and important features, explain its evolution mechanis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basis, realistic basi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make a realistic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asic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reflection, with a view to offering sounding evidence for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Party in economic and social leadership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 (Gong Xiao-ying and Wang Hai-fei)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ew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Historical Evoluti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s: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the past 70 years in New China.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o 1978,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mainly relief-orient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wor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e stages of reform-promoted poverty alleviation, large-scale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ifficulty-overcom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depth poverty allevi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ew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mainly includ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a gradually shift from relief to development, and constant innovation i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promote more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endow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new connotations, effectively link it with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and actively explore system-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goal of normalizing the income of the poor. (Hao Zhi-jing)

The Changes and Experience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a process which must develop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rural governance improvement and improving the deficiencies before the new era.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the changes of rural governanc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In the past 70 yea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rural governanc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ntegrates rural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On the basis of focusing on collective function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individual autonomy of farmers, and attrac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ocial subject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rengthens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and constructs a more pluralistic and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to realize the beneficial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and guarante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countryside. (Li Hua-yin)